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阅读系列教材

丛书主编 邹建军

比较文学文献精读： 经典与案例

主 编 曾小月 李卫华

副主编 常 芳 李伟荣 黄 惠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阅读系列教材

丛书主编 邹建军

比较文学文献精读： 经典与案例

主 编 曾小月 李卫华

副主编 常 芳 李伟荣 黄 惠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文献精读:经典与案例/曾小月,李卫华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4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阅读系列教材/邹建军主编

ISBN 978-7-307-19846-3

I. 比… II. ①曾… ②李… III. 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6574 号

责任编辑:胡 艳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汪冰滢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湖北民政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5.5 字数:603千字 插页:1

版次: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9846-3 定价:4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显要的学问，在文学与语言及相关学科群中，往往发挥着引领潮流的作用。世界文学在我国并非一门学科，而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有时候几乎等同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是一个研究对象甚广、从业人员众多的专业，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教育主管部门将其与比较文学合并一起，成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成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之一。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一样，研究对象范围甚广、队伍庞大，对于两者的合并与融合，学界部分学者虽有不同意见，却也认可两者在研究内容与批评方法上的关联性和同一性。因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起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进行建设，不仅成为了教学与科研的实践，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理论上也富于创见，而有所建树。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我们主编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阅读系列教材（六册），由武汉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教材的编写，一个方面是由于学术研究的推进和学科的发展，另一个方面是出于教学实践的需要。因此，本系列教材的编写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并将此贯彻于编写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一是阅读原则。编写本系列教材的目的在于为学生提供阅读的方便，从而有一个基本的阅读选本，与相关文学史类教材配套使用。因此，虽然分文体而编选，合起来却是一部全面的、具体的和多作品形态的文学史。

二是文献原则。收入本系列教材中的文学作品与相关文献，英文的文献尽量保持原貌，其他语种的文献尽量选择权威版本，除长篇之外一般不节选，节选之作品也尽量保存作品的完整性。所有入选作品都在文末注明原始出处，让本系列教材成为可信可靠的文学文献。

三是导读原则。由于有的文学作品年代久远，有的文学作品晦涩难懂，同时由于中外文化的异质性存在，对每篇收录作品进行导读是有必要的。但导读不可长篇大论，也不重复前人说过的东西，当抓住所选作品的重点、难点和关键之点，进行必要的说明与阐释。

四是创新原则。本系列阅读教材虽以文学文献为主体，却并非一般的文学作品选读。选文尽量不与前人所编重复，并且要拉开相当的档次，以体现新的审美眼光教材编写思想。导读更要体现创造性，自我的阅读体验与独特的价值判断尽量融合其间。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阅读系列教材的编写，是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也是为了推进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建设，从而加强本学科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建设。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缺失和不当在所难免，请各位同道与教材使用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在适当时候进行修订。

邹建军

2017年12月

目 录

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节选)	[法]费尔南·巴登斯贝格(1)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美]René Wellek(7)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美]Henry H. H. Remak(15)
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节选)	[法]雷内·艾金伯勒(23)
比较文学的新动向(节选)	[美]勃洛克(29)
我们:从何来,是什么,去何方	
——比较文学的永久危机(节选)	[美]乌尔利希·维斯坦因(35)
对文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问题(节选)	[苏联]维克多·马克西维其·日尔蒙斯基(42)
现代比较文艺学问题(节选)	[苏联]康拉德(48)
比较文学(节选)	[法]基亚(55)
比较文学论(节选)	[法]梵·第根(63)
比较文学的挑战(节选)	[美]乔纳森·卡勒(69)
《罗摩衍那》在中国(节选)	季羡林(75)
歌德与中国抒情诗	陈 詮(84)
《万叶集》对《诗经》的借鉴	王晓平(92)
美国诗中的禅与道(节选)	赵毅衡(100)
《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节选)	范存忠(108)
歌德与中国(节选)	杨武能(114)
关于提高外国文学史编写质量的几个问题(节选)	杨周翰(121)
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 可能联系	杨宪益(129)
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	[日]中岛健藏(134)
翻译者的任务(节选)	[德]本雅明(139)
中国诗的翻译(节选)	[英]A. C. 格雷厄姆(144)
诗词·翻译·文化(节选)	许渊冲(151)
Fro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Translation Studies(节选)	[美]Susan Bassnett(159)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美]Emily Apter(169)
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节选)	[法]让·马克·莫哈(179)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节选)	[法]巴柔(185)
论“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节选)	严绍璁(191)
比较文学导论(节选)	[奥]彼得·冯·齐玛(196)

中西长篇小说文类之比较(节选)	[美] 浦安迪(203)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节选)	鲁迅(208)
比较文学导论(节选)	[德] 胡戈·狄泽林克(214)
异质同伦与影响变异	
——中日德《灰阑》故事比较谈(节选)	姚玉光(220)
中西复仇文学主题比较(节选)	王立(226)
摩罗诗力说(节选)	鲁迅(232)
文学的历史动向	闻一多(235)
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运用(节选)	[美] 叶维廉(240)
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	王元化(246)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节选)	朱光潜(250)
李渔论戏剧结构(节选)	杨绛(256)
道与逻各斯：中西文化与文论分道扬镳的起点(节选)	曹顺庆(261)
美国诗人如何看待中国诗学(节选)	[美] 钟玲(266)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节选)	[加] 叶嘉莹(273)
中西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节选)	宗白华(279)
中国诗与中国画(节选)	钱锺书(287)
文学与思想史(节选)	[美] 牛顿·P. 斯托尔克奈特(296)
文学与艺术的关系研究	张汉良(302)
弗洛伊德与文学(节选)	[美] 莱昂内尔·特里林(309)
文学与艺术(节选)	[美] 玛丽·盖塞(316)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节选)	[德] 歌德(321)
The Concept of Baroque in Literary Scholarship(节选)	[美] René Wellek(327)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节选)	[美] 亨廷顿(337)
对话的文学理论	
——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节选)	钱中文(343)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展望(节选)	叶舒宪(349)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节选)	费孝通(355)
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多元化标准	[荷] 佛克马(361)
文化相对主义与“和而不同”原则	乐黛云(364)
世界文学(节选)	[印] 泰戈尔(369)
Crossing Borders	[美] Gayatri C. Spivak(374)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节选)	[美] David Damrosch(385)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节选)	[美] Franco Morreti(392)
后记	(401)

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

(节选)

[法]费尔南·巴登斯贝格

【导读】

费尔南·巴登斯贝格(1871—1958)生于法国洛林地区孚日省的圣迪埃市。对日耳曼文化很有研究,1899年发表博士论文《戈特弗里德·凯勒》和《欧伦施莱格》。1901年,巴登斯贝格接替戴克斯特主持里昂大学的比较文学讲座;1902年,巴登斯贝格接手贝茨的《比较文学书目》的编订工作,至1904年,《比较文学书目》正式出版时已增至6000余条。1910年,巴登斯贝格离开里昂大学执教于法国索尔本的巴黎大学。1921年,巴登斯贝格和巴黎大学的同事阿扎尔共同创办《比较文学杂志》。与阿扎尔一起推动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发展,是公认的“法国比较文学的教父”。

《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是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本书节选其中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的内容。《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在比较文学界影响巨大,是法国比较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献,对法国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进行了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探讨。这篇文章几乎揽括了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方方面面,通过阅读它,可以了解法国比较文学的历史,同时,对法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特色会有更加清晰的把握。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对“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的界说,指出“比较”的意义在于两个不同对象的真实性。第二部分列举一些例子说明“比较”应该富有探索性质。第三部分提出问题,一百多年来人们怎样比较,以及比较了什么,认为“比较文学”从18世纪末开始在文学实践与文学理论的历史范围内发生了某种奇异而有教益的演变。第四部分认为文学史效法了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

巴登斯贝格对学界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在研究外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的相互影响时,采用了严密考证的方法,对法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历史性的探寻,从而总结出法国比较文学实证主义的研究特色。

(白阳明)

有人说：“‘比较文学！’文学比较！这是毫无意义又毫无价值的吵闹！我们懂得，它只不过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罢了，而且凭了某些类似的表面现象，便将高乃依和阿尔菲耶里，将德博尔德一瓦尔莫夫人和伊丽莎白·布朗宁，将儒贝尔和柯勒律治，罗宾汉和歇洛克·福尔摩斯进行比较！人们是不是将提醒我们注意，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美学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弥尔顿的史诗并不是塔索的史诗，莱辛和拉丰登的寓言差不多只是名字相同罢了？……”

不消说，一种被人们这样理解的比较文学，看来是不值得有一套独立的方法的，或者说，至少它可能把精神的本能进程的重要性强调到了荒谬的程度。人们一旦熟悉一些诗人，阅读了一些作品，就开始进行比较。知识渊博的马蒙泰尔在他的《文学要素》一书中，就曾经期望每一个当之无愧的批评家来进行比较活动，因为只有那些“拙劣的批评家”，缺乏比较范例和比较对象的人才自行其是。这就是一切真正批评活动的预备阶段，但是，它还仅仅是由于阅读面比较广，了解的情况比较多，认识类似现象比较随便所产生的结果，所以带有偶然性。这种比较可能得益于这样的情况：通过记忆，将维尼的《军人的屈辱和伟大》同克莱斯特的《洪堡王子》进行比较；就认识对象本身来说，他们在中心思想上仍然采取他们各自的立场。如果有所发现的话，也正如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那类作品，在许多方面都令人记起让·保尔那种迂回曲折、追溯往事、捉摸不定、华而不实、冗长啰嗦，加上大量插入句、引号和十分含蓄的隐喻的手法一样，如此而已。因为事实上，任何实际上的巧合都不能造成一种从属关系，从而也不能用来解释从这一作家到那一作家的起点，而我愿意建立起的对比，不会更令人满意（如果它不再向前发展的话），正如同18世纪的一位大胆的生物学家把一朵花和一个昆虫之间的形状和色彩进行精巧的比较那样。十分清楚，真实性不在那里。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点类似点，这样的比较绝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

二

显然，法语的“比较文学”一词不过只是局部地取代了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让我们试举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可以说富有探索性质，而不是令人厌烦的流水账。

一般的“比较”在1760年的《外国杂志》和1754年的《文学年鉴》中，用得已经比较自如；而在1749年9月的《学者报》中几乎认为它是一种方法：“运用这种比较总可以获得巨大的好处……”在1780年2月的《法兰西信使报》上，伽拉（Garat）笔下的“比较研究”已有完整的纲领：“对那些拥有文学的民族引以自豪的作家进行比较研究，也许是最适宜于孕育和培养大量人才的研究……”

让我们继续探求，如果不是在相同的领域，那也是在相邻的领域。1802年，特雷桑神父尝试性地写了《神话学与历史的比较》；维莱尔的《比较色情》显得既放肆又笨拙；而

德热朗多在1804年《哲学体系比较史》中，运用了培根所欣赏的“联系原则”，并自命为是这种总体的完整文学史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1810年索布里的《文学与绘画比较教程》，1814年斯科帕神父的“比较考察”等。

在这些探索之后，紧接着，人们突然发现了那个初具形迹的术语，以及开始确定的观点。诺埃尔和拉普拉斯于1816年起发表他们的《比较文学教程》。维尔曼在他的《十八世纪概况》（1827年和1828年的课程）的序言中谈到一种“比较文学研究”。安贝尔在马赛公学的第一堂课（1830）上，预见到“各国人民的文学艺术比较史”将产生出文学艺术的哲学。1832年，他在巴黎大学的讲课中说道：“先生们，我们将进行这一项工作，没有这种比较研究，文学史将是不完备的……”总之，安贝尔在他的论文集《文学和旅游》的前言中指出，他的这些论文都与比较文学的历史有关联（1833）。也就在这个时候，《历史科学学报》为《比较语文学》开辟了专栏。

两年以后，即1836年1月17日，夏斯勒在公学的第一堂课中，就自己选择的“比较外国文学”这一用语表示歉意：“这一题目，我曾感到唯一合适的题目，从许多方面来看，都缺乏准确性。”为了对夏斯勒在这一领域中的活动作一番分析，1841年肖德-埃格在他的《法国现代作家》中坚持了“比较文学史”这一工作；维尔曼和皮比斯克则在1842年和1843年坚持了“文学比较史”的说法，同样，邦洛埃维于1849年在第戎提供了一篇“文学比较史导言”；上一年，安贝尔在法兰西学院入院演说中，再次谈到“比较文学研究”。A. 杜凯内尔在1846年，把“比较文学教程”作为他的《文学史》的副标题。

所有这些更加全面、更加确切的各种表达方式，几乎都没有给适当的简称让位。

甚至在圣伯夫的这种语言“政变”之后，老的用语也并没有销声匿迹。洛德把他于1886年在日内瓦开设的课程命名为“论比较文学”；埃纳坎在他的《科学批评》的序言中提到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一书，并用英文原文引用了这一书名。J. 戴克斯特将他的《欧洲文学研究》中的第一篇，题名为“论文学比较史”，他通常使用“比较批评”和“比较方法”这些词。同样，布吕纳介在各种较为明确的表达方式和虽不确切但比起所有其他表达方式来有其最大好处——简短——的术语之间犹豫不决。F. 罗力耶的《比较文学史》出版于1903年，而由我再版的贝兹的《比较文学》是在1904年出版的。最后，关于文学比较教学的官方批定是，《比较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同时并存。

三

人们不厌其烦地进行“比较”，难免出现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在这150年里，人们比较了什么，怎样比较？在那些习惯的方法——美学批评、教条主义的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批评和编年史的方法——之侧，比较文学以怎样的形象出现？有时她被认为有野心、不知趣，有时她被迫沉默寡言，但是她的姐姐们从来没有能够把她变成“灰姑娘”。从18世纪末开始，无论在文学实践还是在文学理论的历史范围内，这方面都已发生某种奇异而有教益的演变。

起初大多数的情况是这样：爱国主义的敏感性把原来学说上、习惯上和趣味上的对立情况加深了。国别文学一被唤醒，意大利人、法兰西人、德国人和英国人各自玩弄

了一种归根结底为了鼓励本国文学创作的手段，今天，当这些作品开出丰硕果实的时候，他们又尖刻地将它们的价值进行比较，而这些价值又往往是无法估量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什么？证明莎士比亚的成就高于或低于高乃依；证明现代的古典主义是否真正的古典主义；证明法兰西人绝不可能了解但丁。拉哈尔普或莱辛，约翰逊或巴雷蒂，他们以不同的优点在“比较”中寻找进攻的或自卫的武器。弗雷隆·兰盖则在一部名著中，孜孜以求一些外来的东西，致力于那种渊源探索的雕虫小技，他们不是从中找出一些独创性，而是贬低创造性和揭露“剽窃行为”……赫尔德和维柯，他们将文艺复兴以来从未被人遗忘的思想明确起来，把各国人民的语言、文学和精神状态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因而有机地利用一切决定因素来制约精神生活，通过这样的方法，把比较工作从由于人们的偏爱而把它作为理由和论据的贫乏的教条主义之中拯救出来。从那以后，人们就可以用历史的批评方法对文学现象进行比较和对照；它们的失调就可以用怪现象和不规则等现点来加以解释了；人们可以通过在不同趣味中发现一些社会的，也可能是种族的迹象来避免那种白费口舌的强词夺理；同样，人们也会感到那种肤浅简单的比较的华而不实：1808年，西斯蒙第在给阿巴尼夫人的信中写道：“机灵的人将不同语言的戏剧进行比较，无疑是对艺术大有裨益的；但是接着就从这种比较中得出一通结论，却不可能。每个民族的戏剧都有一种本质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诗学，它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不同于其他民族，并受制于不同的法则……”因此，艺术的相对性（随着它的广泛运用，创作的活力能从中得到鼓励）能在1880年取得胜利，就是由于人们对比较作出了新的努力。在斯达尔夫人，贡斯当，司汤达，《地球》杂志，歌德和曼佐尼那里都显示了这种努力；同时被日益激起的“环境”决定论，也迫使艺术史接受那些不严谨的系统化理论。

另一方面，18世纪人们对原始的和自然的作品所发生的好感，由于各种争执而变得更加强烈，于是在1800年出现了民间诗歌的理论，这些理论探讨民间诗歌在一切名副其实的文学中的崇高地位和内在性。通过F·史雷梅尔、格林兄弟和他们的浪漫主义门徒，通过普里埃尔及其可尊敬的后辈，一系列新的探索激起了学者们的努力。渊源的共同性，雅利安各民族之间存在的最初潜在的亲属关系，由于民间意识的作用而显得真正重要的全部材料所必然引起对于神话的喜爱，所有这些浪漫主义的准备阶段都导致产生了一种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民俗学”或“题材史”，形形色色的比较文学，都向这个中心靠拢。这种研究似乎对材料比对艺术更感好奇，对隐秘的遗迹比对艺术家的创造性更感兴趣；在这里，人们对杂乱东西的关心胜过事物的特征。因此，当谈到真正的文学作品时，流浪的犹太人^①，伊诺克·阿登^②，浮士德原型或唐璜等，都可能被作为这种研究的对象，但其目的则几乎和艺术活动的目的相反……

① 欧仁·苏《流浪的犹太人》中的人物。

② 丁尼生自由体叙事长诗《伊诺克·阿登》中的人物。他是一名水手，流落海外十年，回家后发现妻子已与旁人结婚，为避免破坏她的幸福，自愿隐蔽，孤寂而死。

四

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在19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内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史自然会效法它的方法。居维叶在比较解剖学方面(1800—1805)，布朗维尔在比较生理学方面(1833)，科斯特在比较胚胎学方面(1837)，都已经凭借不同的对象发表了他们从比较研究这一角度写成的著作。他们不是简单地比较“同一群体”的类似事物——这对任何一个观察者来说，显然太容易办到了——以求达到分门别类的目的，而是比较“群体间在某种关系下被人忽视的种种现象，这些现象最正常地属于群体，但必须通过比较，他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才能显示出来，这时人们得到启示：从前被认为毫不相干的群体，相互间是有着亲缘关系和发展过程中的联系的”。

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出发点，而“比较”这一术语有时却使人忘记这一点(生物学方面的比较学科，甚至在欧文和热让博尔的著作发表之后，也不得不常常提醒人们注意，它应该成为一门学科，这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对于文学史来说，向生物科学借用一种方法和一些手法的确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从中发现了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有助于活跃文学史的各种研究。利特雷是一这样的以为学者，他在我国各派学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下，坚定地支持了比较观点的合法性。利特雷，他在中学毕业后，就爱上了比较语言学，并在1830年介入了由于比较解剖学所引起的纠纷，在“统一单位”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表明了态度，在1874年最后一部著作《文学和历史》的序言中，他还提醒人们注意，各种文学都是“姐妹”，不管有什么东西将它们分开。

此外，在物质学科和精神学科的“比较主义”之间，不只在一方面已经出现了中间状态；在A. W. 史雷格尔的著作之后，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产生了包布和迪茨的著作，其他的学科，如比较神话学、比较地理学、比较立法学等也依次出现，且不谈本质就是比较性质的在浪漫主义的荫底下不孚重望的民俗学。

如果安贝尔能够走完他在充满希望时期所开辟的道路，无疑能更自由地建立起比较文学。凭着他对生活和个人的兴趣，凭着一位旅行者与心理学家的好奇心，以及一位研究者本身所具有的遗传意识，他是能够摆脱那个欧洲内部沟通已成为明显事实的时代的；但是，他的性格和好奇心的多变，却使他备尝苦难，这也就是天才所受的磨折。

他的同代人不安地看到，在我国逐渐和丹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在文学艺术史中取得了位置。无疑，这种超群的才智没有抛弃已经越出了过分狭窄范畴的大量概述性的东西。丹纳在他的著作中，处处暗示人们注意整体的联系，机敏地启发读者。多少次，他马不停蹄，对那些通过比较能得到更明确阐述的关系进行对照，如莎士比亚和拉辛，缪塞和丁尼生，古代人和现代人，浮士德和曼弗雷德，弗朗德和意大利等的关系；或者进行有利于说明思想互相影响的类比，如法兰西的专制主义和英国的复辟，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德国的宗教改本等……可是，他所偏爱的原则是“汇集”，是力量和效果的协调，他认为，“艺术作品由整体所决定，而整体则是精神和周围环境的总的状况”，他在一首诗歌和一个种族中同时发现“内部结构”，他的这些日益增多的论点和各种比较方法大量的实践却是背道而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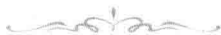
如果和丹纳的名字有着关联的这些理论的严格性没有被不同的概念削弱的话，比较文学能否向前迈进一步呢？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不管怎么说，在将近 19 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几乎到处都看到一种努力，它正力图用一种更直接的比较方法，并列于在降低了要求的丹纳的整个学说旁边，而且常常还是叠架于这些思想之上。一些小国的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他们国家的民族性较弱，因而他们具有某种世界主义的本能，尤其是 G. 勃兰兑斯，Ed. 洛德，马尔克·莫尼埃和 V. 罗塞勒等人的名字，和这种“欧洲主义”有着关联，无论怎么说，“欧洲主义”对囿于小国范围的情感来说是一种飞跃。1886 年，波斯奈特把他的比较文学理论建立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各阶段的基础上，这说明他对人类社会学的主要分类看得特别重要。对于他对于美国、英国任何一个由他发起的小团体来说，社会的进化——从氏族过渡到城邦，从封建集团到国家集团等——有力地支配着种族的从属关系或者物质环境的决定作用；比较文学随着艺术和社会的变化之间多少有意识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徐鸿 译)

(节选自费尔南·巴登斯贝格：《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2-40 页。)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美] René Wellek



【导读】

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从内容上可分三部分，首先主要指出了比较文学研究“岌岌可危”的处境，接着分析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及其危害，最后提出解决方法。“岌岌可危”的处境主要表现是：第一，未能确定研究内容和专门的研究方法论；第二，从狭义上理解比较文学，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导致比较文学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科学；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得文学被当成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导致研究本身失去了其客观性。基于以上种种弊端，韦勒克提出要彻底废除“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限，重新调整理论、评论和评论史，这样才能解决比较文学的危机处境。一些比较文学家，如梵·第根、伽列和基亚巴斯登贝格等，尝试建立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但都宣告失败。梵·第根试图将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划清界限，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而总体文学则着眼于席卷几国文学的运动和风尚。韦勒克指出这种区分不切实际，在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构筑了一道人为的障碍。这是一种仅研究外部情况的狭义做法，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间的“贸易交往”，致使比较文学成为了仅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科学。伽列、基亚则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包括对民族幻想的研究，以及对国家之间相互渗透的固定看法的研究。韦勒克认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大，已经超越了文学研究的研究范围，意味着承认研究内容贫乏，而且还把文学研究融入了社会心理学研究、文化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巴斯登贝格提出文学研究的范围应当扩大到包括一些次要作家，同时注意同时代人的评价。韦勒克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种划分暗示了历史相对主义。关于在“比较文学”的心理动机和社会动机方面，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充当两国之间的中间人和调停人反对19世纪学术界的狭隘民族主义，对法、德、意、英等国的文学史家的孤立主义表示异议；另一方面，这些人的真诚愿望总是为当地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淹没和歪曲，从而导致了把比较文学当作文化扩张和实现民族虚荣心的手段这种现象的产生。

韦勒克不仅看清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危机及其原因，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在研究内容和范围上，他主张把“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限彻底废除，要把文学研究视为不受语言限制的统一学科，让人人都有权讨论任何问题，甚

至研究历史、哲学和任何其他课题。同时指出，文学研究界很有必要确定研究内容和中心，回归到对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研究上来，应当把文学研究同思想史研究、宗教及政治观念和情绪的研究区分开来，正确理解文学研究的概念。关于方法论，他强调必须正视“美学性”的问题，因为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他提出要克服内容和形式的分离、打破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之间的界限、反对在历史研究和形式研究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要把艺术作品看成是一个有机体，要用理论、批评和历史通力合作来描述、阐释和评价一部或一组艺术作品，而不要死死抱住“事实联系”、渊源、影响、媒介和名望；比较文学应当回到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洪流中去，评论不能也不应该被逐出文学研究领域。虽然该文发表时至今日已半个多世纪，但韦勒克所披露的不少问题如今仍富有挑战性。

(李伟荣)

The world (or rather our world) has been in a state of permanent crisis since, at least, the year 1914. Literary scholarship, in its less violent, muted ways, has been torn by conflicts of methods since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old certainties of nineteenth-century scholarship, its ingenuous belief in the accumulations of facts, any facts, in the hope that these bricks will be used in the building of the great pyramid of learning, its trust in causal explanation on the model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had been challenged sharply even before; by Croce in Italy, by Dithery and others in Germany. Thus no claim can be made that recent years have been exceptional or even that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cholarship has reached anywhere a point of solution or even temporary accommodation. Still, a re-examination of our aims, and methods is needed. There is something symbolic to the passing, in the last decade, of several of the masters: Van Tieghem, Farinelli, Vossler, Curtius, Auerbach, Carré, Baldensperger, and Spitzer.

The most serious sign of the precarious state of our study is the fact that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establish a distinct subject matter and a specific methodology. I believe that the programmatic pronouncements of Baldensperger, Van Tieghem, Carré, and Guyard have failed in this essential task. They have saddl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ith an obsolete methodology and have laid on it the dead hand of nineteenth-century factualism, scientism, and historical relativ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the immense merit of combating the false isolation of national literary histories; it is obviously right (and has brought a mass of evidence to support this) in its conception of a coherent Western tradition of literature woven together in a network of innumerable Interrelations. But I doubt that the attemp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made by Van Tieghem, can succeed. According to Van Tieghe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confined to the study of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wo literatures while “general” literature is concerned with the movements and fashions which sweep through several literatures. Surely this distinction is quite untenable and impracticable. Why should, say, the

influence of Walter Scott in France be conside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hile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during the Romantic age be "general" literature? Why should we distinguish between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Byron on Heine and the study of Byronism in Germany? The attempt to narro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a study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literatures is surely unfortunat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ould be, in subject matter, an incoherent group of unrelated fragments; a network of relations which are constantly interrupted and broken off from meaningful wholes. The *comparatiste* qua *comparatiste* in this narrow sense could study only sources and influences, causes and effects, and would be even prevented from investigating a single work of art in its totality as no work can be reduced entirely to forcing influences or considered as a radiating point of influence only toward foreign countries. Imagine that similar restrictions would be imposed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usic, the fine arts, or philosophy! Could there be a compress or even a periodical exclusively devoted to such a mosaic of questions as, say, the influence of Beethoven in France, of Raphael in Germany, or even Kant in England? These related disciplines have been much wiser; there are musicologists, art historians, historians of philosophy, and they do not pretend that there are special disciplines such as comparative painting, music, or philosophy. The attempt to set up artificial fences between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must fail because 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scholarship have one subject: literature. The desire to confin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the study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two literatures limits it to a concern with externals, with second-rate writers, with translations, travel books, "intermediaries"; in short, it mak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mere sub discipline investigating data about the foreign sources and reputations of writers.

The attempt to set apart not only the subject matter but also the method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as failed even more signally. Van Tieghem sets up two criteria which supposedly distinguis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the study of national literatur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concerned, he tells us, with the myths and legends which surround the poets and it is preoccupied with minor and minimal authors.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see why a student of a single national literature should not do the same: the image of Byron or Rimbaud in England or France has been successfully described without much regard to other countries and, say, Daniel Monet in France or Josef Nadler in Germany have shown us that one can write national literary history with full attention to ephemeral and forgotten writers.

Nor can one be convinced by recent attempts by Carré and Guyard to widen suddenly the scop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order to include a study of national illusions, of fixed ideas which nations have of each other. It may be all very well to hear what conceptions Frenchmen had about Germany or about England-but is such a study still literary scholarship? Is it not rather 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useful, for instance, to a program director in the Voice of America and its analogues in other countries? It is national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as literary study, nothing else but a revival of the old *Stoffgeschichte*. "England and the English in

the French novel" is hardly better than "the Irishman on the English stage" or "the Italian in Elizabethan drama". This extens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mplies a recognition of the sterility of the usual subject matter at the price, however, of dissolving literary scholarship into social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history.

All these floundering are only possible because Van Tieghem, his precursors and followers conceive of literary study in terms of nineteenth-century positivistic factualism, as a study of sources and influences. They believe in causal explanation, in the illumination which is brought about by tracing motifs, themes, characters, situations, plots, etc., to some other chronologically preceding work. They have accumulated an enormous mass of parallels, similarities, and sometimes identities, but they have rarely asked what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supposed to show except possibly the fact of one writer's knowledge and reading of another writer. Works of art, however, are not simply sums of sources and influences; they are wholes in which raw materials derived from elsewhere cease to be inert matter and are assimilated into a new structure. Causal explanation leads only to regressus ad infinitum and besides, in literature, seems hardly ever unequivocally successful in establishing what one would consider the first requirement of any causal relationship: "when X occurs, Y must occur." I am not aware that any literary historian has given us proof of such a necessary relationship or that he even could do so, as the isolation of such a cause has been impossible with works of art which are wholes, conceived in the free imagination, whose integrity and meaning are violated if we break them up into sources and influences.

The concept of source and influence has of course worried the more sophisticated practitioner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or instance, Louis Cazamian, commenting on Carré's book *Goethe en Angleterre*, sees that there is "no assurance that this particular action made this particular difference." He argues that M. Carré is wrong in speaking of Goethe's "having, indirectly, provoked the English romantic movement" merely because Scott translated *Goetz von Berlichingen*.^① But Cazamian can only make a gesture toward the idea, familiar since Bergson, of flux and becoming. He recommends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psychology which, with Cazamian, means an elaborate, totally unverifiable theory of the oscillations of the rhythm of the English national soul.

Similarly also, Baldensperger, in his programmatic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number of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1921) saw the dead end of literary scholarship preoccupied with tracing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themes. They can never establish, he admits, clear and complete sequences. He rejects also the rigid evolutionism propounded by Brunetiere. But he can substitute for it only the suggestion that literary study should be widened to include minor writers and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ontemporaneous evaluations. Brunetiere is too much

① "Goethe en Angleterre,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es problèmes d'influence," *Revue Germanique*, 1921 (12), 374-375.